

再 谈 财 政 问 题

王 丙 乾

中 共 中 央 党 校

一九八〇年六月

党校要我来给同志们讲一讲财政方面的问题，去年我讲过一次，讲得比较具体，这次只讲几个有关的问题。在四化建设中，财政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，它通过资金的积累、分配和监督使用，来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改善，这方面工作搞得好不好，对全局关系很大。大家关心财政问题是理所当然，我来讲这个问题也是义不容辞。但是，由于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没有多少时间准备，肯定讲不好，请同志们原谅。这次讲三个问题：

一、建设方针问题

搞建设就需要资金，搞四个现代化就需要有更多的资金。而能不能积累更多的资金，不在于财政本身，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治、经济战略方针。回顾三十年的情况，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近百分之十。总的说，增长速度并不低，问题是年度之间波动幅度太大。例如，“一五”时期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三，是持续上升的；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，来了一个折腾，结果是“二五”期间财政收入的平均年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零点二，想快反而慢，甚至倒退到“饿肚子”、“闹浮肿”的地步，教训是很深刻的。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被迫采取调整措施，不少企业关停并转，基建压缩到五十五亿元，职工精减下放近二千万人，总算度过了困难，并使国民经济转入正常发展的轨道。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，财政收入平均年增长百

分之十四点七。但情况刚刚好了几年，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有错误，头脑又发热，来了个文化大革命。其实不是“文化”，而是“武化”，到处是打、砸、抢，“打倒一切”、“全面内战”，国民经济倒退到崩溃的边缘。这一次大破坏，涉及范围之广，持续时间之长，造成的损失之严重，都是建国以来空前的。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间，财政收入的平均年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三点三。

我们算了一笔账，如果不发生几次瞎折腾的情况，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二十年间，我们的工农业生产速度可以达到百分之八以上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七以上（“一五”期间轻工业的比重较大，工农业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十点九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十二点三），按这个速度与实际比较，二十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少实现一万四千亿元左右，财政收入少收三千亿元左右。如果加上支出方面的损失浪费、无效投资、平调退赔和处理遗留问题等，财政上总的损失估计有四千八百多亿元，相当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总数。这就是二十年间几次折腾付出的巨大代价，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三年后的今天，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仍有一大堆，拖着我们前进的后腿。

经济上的折腾，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动乱。但是，政治上有极左的干扰，经济上也必然有极左的干扰，两者互相影响，值得我们认真回顾和分析。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、政策来检查，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：

（一）用政治代替经济，忽视国民经济发展的固有的内在规律，也就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。长期以来把政治、阶级斗争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，什么“抓了阶级斗争，生产就上去了”，“有了政治挂

帅，一切就有了”，“要算政治账，不要算经济账”，规章制度是“管、卡、压”等等，使人们忽视了对经济规律的探讨，忽视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，忽视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加强，忽视了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。这方面的影响，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消除。

(二) 凭主观想象指导经济，不讲实事求是，急于求成，欲速不达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，强调要翻番，谁要说个“不”字，什么“促退派”、“保守派”、“秋后算账派”等政治帽子一齐压下来。文化大革命中也提出“鞍钢三年翻一番，大家怎么办？”于是都提大计划、说大话，一哄而起，事后又不了了之，即使造成经济损失，也不负什么经济责任。订计划的时候，口头上总是讲要“留有余地”，实际上年年有一大堆缺口。最突出的是基本建设，明明钢材、水泥、木材都有缺口，却偏偏要往上加。结果是物资紧张，基建挤生产，生产挤维修，工厂停停打打，机器带病运转。反映在财政上，就是四面叫紧，不得不留缺口、打赤字。这种做法，使基建战线越拉越长，摊子越铺越多，许多项目长期不能建成投产，占压着一大批资金，长期打消耗战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，也影响了财政资金的积累速度。

再就是只讲主观需要，忽视客观可能，往往是闻风而动，一拥而上。例如，一说要搞三线建设，就是大小三线一齐上，甚至强调内地有的，三线要有；内地没有的，三线也要有。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九年，大小三线投资达 $\times$ 千 $\times$ 百亿元，占同期基建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。由于突击建设，缺乏全盘规划，不少厂子不配套、不衔接，或者技术不过关，任务吃不饱，花了那么多的钱，并不能充分发挥效用。又如，一说要搞农机化，就不顾实际是否可能，一拥而上，齐头并进。全国拖拉机厂达到一百四十多个，而大小拖拉

机产量却只有十几万台，手扶拖拉机二十来万台。再如，一说要逐步建设几个大区的工业体系，也是一哄而上，许多省都要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，要搞工业省，甚至有的县也要“自成体系、县自为战”，搞工业县。类似这种一阵风的搞法，不仅助长了瞎指挥、浮夸风，而且严重地破坏比例关系，影响建设速度，今后再也不要搞了。

（三）忽视综合平衡，破坏了经济发展中应有的比例关系。国民经济必须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，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。过去的阶级社会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，客观上也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，但是他们不可能自觉地有计划地做到这一点。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点，决定我们能够通过计划来自觉地进行综合平衡，从而使国民经济保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。但是，可能并不等于“必然”，搞得不好，同样也会比例失调，受到惩罚。这方面，过去我们吃过不少苦头，也受到了它的惩罚。例如：

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上，建国初期搞得比较好，后来总结出了“二、三、四”的经验（即积累基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，不低于百分之二十，或者略高一点；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，不低于百分之三十，或者略高一点；基建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，不低于百分之四十，或者略高一点），但不久就被扔到一边去了。以后许多年份积累所占的比例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，最高的年份曾达到百分之四十三点八，以致破坏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比例关系，造成了大量欠账，不得不退下来；等到刚刚缓了一口气，积累所占的比例又被强行拉上去，最后又被迫退下来。这样，一进一退、一上一下，每次都造成经济生活中的混乱和经济上的大量损失。从历史经验来看，积累比例高的年份，经济发展并不快，而保持合理比例的时候，

经济发展比较快。这说明在国民经济中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在农轻重的关系上，每一次总结经验、制定计划时，口头上总是强调农轻重的次序，但实际干起来却往往是重轻农。一九五八年以后，强调“以钢为纲”、“为钢让路”，只顾一头，不顾其他，结果挤了农业，挤了轻工业，文教科学更不用说了。六十年代又强调搞大小三线建设，以军事工业为中心，也是挤了农业、轻工业和科学文教，并且影响了一二线地区的建设，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。

在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上，口头上承认应当是先简单再生产、后扩大再生产，先维修、后生产，先生产、后基建，先挖潜、后新建，实际干时却往往相反。在计划安排和物资分配上都有这种情况，几乎成了老规矩，这怎么能不发生问题呢？有些事情，一年挨挤还不要紧，年年挨挤，长期欠账，就成了严重问题，既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，也影响财政积累的增长速度。

上面讲的这些问题，都是政治上、经济上极左干扰的产物。目前正在编制长远规划，我们要认真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，并吸收国外经验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，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党所确定的政治路线、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落实到经济工作中去，把我们具体的经济路线搞明确，把建设方针搞对头，这样才能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，并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。

关于今后的经济建设方针如何提法，尚需过细的研究，用一两句话也难以概括起来。我感到有几个带方针性的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考虑。

（一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，把国民经济搞活搞好。最近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“发挥优势，保护竞争，

推动联合”。这是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矛盾提出来的，目的是为了把经济改革推进一步，我们完全拥护。我体会，发挥优势、保护竞争、推动联合这三句话是互相联系、不可分割的。我们知道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，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企业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，只有发挥优势，避开劣势，扬长避短，才能把经济搞快搞好一点。这种扬长避短的实施，主要是依靠我们计划的调节，同时，也要依靠必要的市场调节，也就是通过竞争，使优势与劣势进行较量。不搞点竞争，不从政策上、体制上保护这种合法的竞争，生产就不容易搞好，产品质量和花色品种也上不去，而市场调节也搞不起来。经济规律是无情的。开展竞争以后，必然有上去的，大大发展的，也有被淘汰的。这样就要给它一条出路，即走联合之路（联合投资、联合经营），联合起来好处多，力量大，大家都受益，积极性高，经济发展会快不会慢。这方面的问题如何办比较好，需要在实践中试验、补充、完善、提高，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東西。

（二）订计划，办事情，都要坚持实事求是，留有余地，量力而行，稳步前进。实践证明，这样做效果好，人心舒畅。如果要求过急，计划绷得过紧，往往欲速不达，造成很大损失，并挫伤群众的积极性。叶剑英同志曾经说过，不怕慢，就怕走弯路，大上大下。过去我们的毛病往往出在大上大下上面，不量力而行、超过客观可能的大上，必然带来大下，因为不大下即难以为继。而大上大下的结果，必然给生产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和浪费，想要快，实际慢。还有一条经验教训必须记取，就是情况一好，往往就折腾，不留余地，不讲综合平衡，最后走向事情的反面，受客观规律的惩罚。我们搞经济工作的，既要有战略远见，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才行。

陈云同志说得好：“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，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，但他们又要求不再折腾。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。我们应该探索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”。

最近三位日本经济专家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和提供了建议，很值得我们考虑。他们讲：六十年代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五点二，七十年代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七（工业发达国家下降百分之三点一，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八，十年内上涨一点二倍），形成“滞、涨”局面。八十年代经济停滞动荡的局面将近一步加深，经济的发展速度将减慢到百分之三左右（经济发达国家百分之二至二点五，发展中国家百分之四点三至四点五）。他们建议中国近期内不要过分强调数量和速度，而应力求打好基础，稳步前进。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，但还不具备飞跃发展的条件。因为农业生产还不足以保证十亿人口生活和工业发展的需要；发展工业，包括能源、运输等，需要大量的投资，目前还难以满足；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，缺乏刺激提高生产的制度，改革还需要一个过程；对外贸易的能力也不强。因此，不应过高地追求速度。他们建议，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定为百分之五至五点五，即使这样也高于其他国家，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，将由八〇年的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七。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日本专家的意见很好，应该好好考虑这个建议。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，日本经济专家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，所提建议比较客观，值得我们很好研究。

（三）正确处理消费与积累的关系，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。在各种比例关系中，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问题。从一九七〇年以来，我们的积累比例偏高，一般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，一九七八年达到百分之三十六，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不

利的。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示，搞长远规划积累比例按百分之二十五安排，大家都一致拥护。中央下这个决心是十分必要的，是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。为什么把积累基金的比例定为百分之二十五是合适的呢？我看至少有三条：一是从三十年实践来看，积累比例过低不好，过高也不好，百分之二十五比较适当；二是搞长远规划，应当比年度计划留有更多的余地，搞得更加稳当一点，计划绷紧了，是要吃亏的；三是积累比例低一点，有利于逼着大家去抓经济效果，少花钱多办事。同时消费方面搞得松动一点，可以多办一些改善人民生活的事情，这对于安定团结、调动积极性、搞好全局是很有利的，这说明，控制积累率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。那么，积累比例搞百分之二十五，是否经济发展就没有速度了呢？不能这样看，钱多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好，钱少了也不一定把事情办得差，关键是要把资金使用方向搞对头，大力提高投资效果，包括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在内。只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，就可以少花钱，多办事，把事情办好，实现多快好省。最近中央决定压缩基建总规模，改变大项目的审批程序，严肃基建纪律，就是为了加快建设速度，提高投资效果，减少损失浪费。这是对人民对党的事业负责的表现。

（四）坚持农轻重的方针，在经济结构方面走轻型化的路子。从中国的情况和世界一些国家的情况看来，毛主席提出的农轻重这个方针是正确的。我们应该优先发展农业，先把农业和轻工业搞上去，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发展重工业，这样经济发展只会快不会慢。当前发展农业，主要是靠政策、靠科学，国家不必拿很多钱，但将来还是要花很多钱的。轻工业必须大大发展，它投资少，收效快，对财政、市场、出口都很有利。轻工业积累资金多了，就有钱来发展

重工业，日本叫做“以轻养重”。对重工业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如煤、电、油、运就要优先发展，但钢铁和机械工业，目前可以少投资，暂时放慢一点，不再铺新摊子，主要搞品种、质量、提高技术，不要追求数量。轻型结构的提法是否确切，还可以研究，但在改变经济结构方面，大有文章可做，从结构中求速度，是一条新的路子。

（五）在承认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，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，可以考虑走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的路子。据了解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种类型：一是集中型，先从一个或几个地区突破，带动全国；一是分散型，全国平衡发展。日本、美国的发展都是集中型。从我们的经济来看，齐头并进，全面开花，平均使用力量，没有重点，经济效果并不好。似乎可以考虑，先在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多投一点资，使他们发展得快一点，然后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。从一个省来说，先集中搞几个重点，然后带动全省，这样短期内可以得到明显的效果。当然，这样做并不是要忽视其他地区，而是说一定时期内，在全面安排之中，要突出重点，有先有后，波浪式地前进。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发展快了，对全国可以多做贡献，对经济落后的地区才有力量支援。这个问题应当好好研究一下。

（六）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。除了解决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方针问题以外，还有一个加强领导、提高工作水平的问题。我感到从一九五八年到“四人帮”垮台这一段（三年经济调整时期除外），由于极左的干扰，我们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也是有不少问题的。比如：处理政治问题比较严肃认真，处理经济问题则比较马虎，过去经济上出了问题，不追究责任，几千万、甚至几亿元的损失，打个哈哈即过去了。这种作法往往助长经济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，办事不认真，缺乏严肃负责的精神，对工作危害很大。又如，不注意

调查研究，听不得不同意见，好高骛远，急于求成，说大话，说空话，甚至瞎指挥，这怎么能把财经工作领导好呢？又如，在经济上重生产，轻管理，注意抓投资，不抓经济效益，以致我们的经济管理水平 and 经济效益不是提高了，而是降低了。又比如，不讲法治，强调人治，往往一个人一个说法，前后左右矛盾，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一个制度，形成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的状况。一些地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，对国家规定的制度“各取所需”，“择优选用”，各行其是，谁也管不了谁。我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而经济工作又十分复杂，没有健全的制度是办不好事情的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这方面的情况有很大改变，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，同形势发展很不适应。为了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，改进我们各级各部门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，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，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。

二、经济效益问题

我们搞了三十年经济建设，工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发展速度为百分之八，比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低；国家为建设事业花的钱共达一万五千六百亿元（预算外资金约三千多亿元还不在于内），钱也并不多，应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。但为什么现在还这样穷呢？除了我国底子薄、基础差以外，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就是我们长期以来，不讲经济核算，经济效益很低，在基本建设和生产方面都打了消耗战，创造的社会财富少，再加上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搞得不适当，所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，人民是不满意的。

不讲经济核算，不讲经济效益，有各方面的原因。从历史上看，

过去搞的战时供给制，在战争年代是起了很大作用的。但是这种“供给制”、吃大锅饭的思想，带进到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来了。我们的某些制度办法也有这种供给制的特点。这是不适应当前情况的，也是有害的。当然，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，而在于多年来极左思潮的影响。好象讲核算，讲效果，讲经济利益就是资本主义，而不计工本，不计得失，不讲利润，只要搞上去就是胜利，似乎是“社会主义”，似乎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，我们过去办了不少图虚名、受实祸的傻事。如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中，烧毁了大量木材和山林，砸毁了大量铁锅和铁器。这方面的账是算不清的。能够算账的，光是财政上拨付的小钢铁亏损，三年就有一百一十亿元，而炼出的钢铁都不能用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这方面有了恶性发展，到处批“唯生产力论”，批“利润挂帅”，形成“赚钱可耻、赔钱光荣”。一九六七到一九七六这十年间，国营企业亏损共达九百四十八亿元，扣除粮食亏损和其他政策性的亏损，属于经营管理方面的亏损约为四百二十亿到五百亿元。这实际上是吃社会主义，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。经济发展的速度当然上不去，更谈不上人民生活的改善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抓经济核算和经济效益问题，这两年情况有了改变，大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。但是总的说来，许多同志还重视不够，特别是还没有从国家计划管理到企业经营管理各个环节，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经济责任制，生产建设中的各种浪费现象还是相当严重的。我们认为，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战略方针的高度，下决心从计划安排、经济结构、工业调整、经济管理等各个方面，采取措施，认真解决。否则，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上不去的。

从财政状况来分析，至少在最近几年内，要想靠增加很多投资来把生产速度加快搞上去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原因很简单：第一，一九七九年出台的重大经济措施比较多，而且要继续搞下去，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、减免税收、调整工资、恢复职工奖金、待业人员就业等，几件事一起办，三年之内国家要拿出六百亿元。这样就把财政收入增加的部分吃掉了，不可能再拿出很多钱来增加基本建设和其它方面的开支。第二，为了解决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问题，调整比例关系和改革经济体制，头几年总是要花代价的。这种代价必然要反映到财政上来。一九七九年国家财政已经发生很大的赤字，今明两年还会继续发生赤字。为了尽快地消除赤字，除了努力增加收入外，还得适当控制与压缩支出。第三，目前能源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，估计近几年内石油可能上不去，电力缺口很大，煤也不富裕。即使我们能够建设一些新厂，由于能源和原材料不足，也难以正常开工生产，创造财富，增加收入。这三条原因，大家可能都是清楚的。那么，要想多搞一些基本建设和其他事业，还有没有其他出路呢？比如能不能发行公债和多借一些外债？我们考虑，发点公债是可以的，但解决不了多大问题，而且发多了，或者连续发，群众是会有意见的。借点外债也是可以的。凡是能引进的要尽量引进，但是不能超过一定限度（国际上计算偿还能力，每年还本付息数字，一般不能超过当年出口收汇额的百分之二十），而且借自由外汇的贷款利率很高，前些时候曾高达百分之二十左右，实际上是高利贷，四、五年翻一番，代价很大。借债总是要还的，如果我们借的过多，或者建设项目不能很快投产出效果，就会发生偿还不了的问题，那就要出大纰漏，影响我国的国际信誉。因此，对利用外资搞建设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，慎之又慎，千万不能感情用事。我们认为，比较可行

而又可靠的出路，就是大搞增产节约，挖掘内部潜力，狠抓经济效益。这样，就可以做到少花钱，多办事，把事情办好，创造出一个多快好省的大好局面来。

现在经济方面存在什么问题，有哪些潜力，如何来挖，这是需要很好研究的，初步提出这样几点：

（一）坚决改变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企业自成体系，各搞一套，重复建设的状况。这里有三种情况：一是当前要集中力量搞全国的经济体系，进而逐步搞几个大区的体系，不要不顾可能和条件，再搞省体系、县体系。二是要发展专业化协作生产，不要搞大而全、小而全，纠正地区之间、企业之间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的状况。三是在行政事业单位之间和社会生活方面搞社会化，不要各搞一套。目前这些方面的问题很多。其原因，既有方针、政策和体制方面的问题，也有小农经济习惯势力的问题。对此，要引起我们的重视，下决心解决一下。如果解决好了，对国家将是一个极大的节约。从而可以腾出钱来办更急迫的事，大大加快四化的建设速度。如果继续任其发展下去，则是一个极大的浪费。有限的财力用不在刀口上，必然延缓四化的建设速度。这方面的浪费有多少，危害有多大，我们还算不出来。

（二）坚决扭转基本建设战线长、浪费大、投资效果差的状况。我们年年讲缩短基本战线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，但年年实现不了，成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。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：一是基本建设的战略目标定得太高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就想多上项目。二是经济体制很不适应。有些事情通过协作搞不通，物资分配保证不了，就想各搞一套，自己用着方便。三是不重视老企业的挖潜改造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作用，热衷于搞新建项目。四是资金渠道多，无偿

拨款，也助长拉长战线。拉长战线的结果，就是工期拖长，造价提高，长期打消耗战（“一五”时期各种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平均为五年左右，现在拖长到十年左右，每拖长一年，不算物资材料的损失，光人工费用就要多开支五十亿元）。为了加快四化的建设速度，今后要注意安排与控制总的基建规模，把它定在既符合长远规划要求、又不超过财力物力可能的水平上，并且要注意统筹安排，合理布局。要多搞挖潜改造，少搞新建。要整顿资金渠道，逐步推广贷款的办法。现在在建工程很多，一千几百个，搞完尚需 $\times$ 千 $\times$ 百亿元的投资。看来需要加以清理和整顿，抛掉一些包袱，集中力量把有发展前途和同长远规划有密切关系的项目搞起来，这样才能轻装前进。对国外进口的大项目，要慎重研究，好好安排，否则也会影响建设的速度。

（三）大力节约能源，从节约中求增产。目前能源紧张是世界性的，我国也不例外。由于能源不足，影响了企业的增产。除了积极设法加快能源的开发工作外，还要大力节约能源。目前我们能源浪费很大，据说每年多消耗的能源，折合标准煤有五千多万吨。如果我们下功夫降低能源消耗，把节约能源的工作抓好，就可以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。

（四）认真整顿企业，改善经营管理，做到增产又增收。基本建设和生产方面这两个消耗战，如果不切实解决，就可能把我们打穷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很低，大多数企业的经济、财务指标尚未达到历史较好的水平。例如，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提供的积累（包括利润和税金），一九六五年为三十四元三角，一九七〇年为二十九元六角，一九七八年为二十五元一角。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，一九六五年为二十八元一角，

一九七〇年为三十一元九角，一九七八年为三十三元六角。企业的设备能力利用率也很低，我国拥有的各种机床共二百六十八万台，目前重点机械厂机床的利用率仅为百分之五十五点六，非重点企业只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，这等于全国有一百三十万台机床闲置未用。现在企业的亏损还不少，经营性亏损约有五十亿元左右。如果下决心把企业整顿好了，把经营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，不用建什么新厂，就靠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，一年就可以增加收入和减少资金占用一、两百亿元。

（五）实行军民结合，发挥军工企业的作用。许多国家军工与民工通常是不分开的，我们则单独搞了一套军工企业。目前军工厂人马不少，设备齐全，技术力量也比较强，但是往往任务吃不饱，在那里饿肚皮。我们要切实搞好军民结合，在保证军工任务的前提下，让他们多搞民用、出口。凡是军工厂能生产顶替的，今后即可不新建同类型的民用工厂。把军工企业这一部分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起来，既可省下一笔投资，又可以为国家创造财富，一举两得，在长期计划中应当很好考虑安排。

（六）大力发展外贸和旅游事业，为发展国内生产服务，为国家多创外汇收入，多增加上交利润。

（七）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。这个问题在农业方面特别突出，国家每年用于农业的资金（包括基本建设、流动资金、事业费等）不过一百亿元左右，发展农业主要是靠社队集体经济的力量。如果党的政策对头，符合群众意愿，不用国家多花钱，农业也可以搞上去。反之，政策不对头，挫伤群众积极性，必然造成农业生产的停滞倒退，甚至带来灾难性的破坏。过去的经验教训很说明这个问题。发展工业也要靠政策，如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，实行正确的价格、

税收和信贷政策，以及技术政策等，明确规定鼓励什么，限制什么，同样可以推动生产的发展。政策要相对稳定，不宜朝令夕改，否则就会失信于民，也失信于官，并且造成很大损失。如水电部反映，前几年由烧煤改烧油，花了改造费八亿元，现在改回来，又要花一大笔钱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浪费！

三、财力分配和平衡问题

在我国现有条件下搞四个现代化，财力适当集中为好，还是继续分散为好，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。

经过三十年的建设，我们的国家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物质基础，已经建设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。但是，由于我们国家大，人口多，原来的水平又很低，相对而言，现在的家底还是相当薄的。我们的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计算，只有一百八十三美元，在联合国一百五十一个国家里，占一百几十位，是属于最贫困线以下的。由于我们的家底薄，国家财力有限，为了加快建设速度，保证重点，集中力量解决带战略性的问题，财力分配宜于适当集中，不宜过于分散。这个看法对不对，可以研究。

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财政比较集中，保证了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建设，效果是好的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，财政体制先放后收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财政开始向下分散。如一九六七年起，把折旧费逐步留给企业和地方；一九七〇年又放下了绝大部分中央企业，其它财政制度以后也有很多变化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财权和财力过分集中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，可以从三个方面情况来看：

（一）地方财政收支占国家财政收支的比例扩大了。“一五”期